

南开風文丛

中国现当代文学 动物叙事研究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
DONGWU XUSHI YANJIU

唐克龙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风文丛

中国现当代文学 动物叙事研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研究 / 唐克龙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310-03309-6

I. 中… II. 唐… III. ①现代文学—动物—叙述—文学研究—中国②当代文学—动物—叙述—文学研究—中国
IV. I206.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14322 号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肖占鹏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25 印张 2 插页 246 千字

定价: 1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

乔以钢

七年前,克龙君携家北上,在南开园里开始了艰辛求学的时光。三年时间里,他承受着来自学业和家庭经济上的双重压力,克服重重困难,心无旁骛,勤奋治学,给与他有所接触的老师 and 同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博士毕业后,克龙回到岳麓山下,执教于湖南大学。现在,他的学位论文即将由母校出版社出版,我为他感到由衷的高兴。

这部著作涉及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母题——“人与自然”的关系。众所周知,近百年来,伴随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人类生存环境持续恶化,物种不断减少,资源日渐匮乏。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面对这样的现实,20 世纪以来,有识之士对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以及人类自身行为的失范进行了严肃反思,从文化危机的高度认识生态危机的实质,呼吁树立生态文明观念。可以说,在当今人类寻求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时,努力推进以生态文化为基础的生态文明的建设,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与此相应,当代文学领域动物叙事的文化内涵不断丰富,思考趋于深化。然而,尽管自然界中的动物在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叙事类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生动的艺术表现,动物叙事作为具有独特人文意味的文学现象日益引人瞩目,但迄今为止,就此进行专门考察的成果尚属罕见,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近乎空白。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进行的探讨具有学术创新意义。

书中,作者在较为宽阔的理论背景下,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动物叙事与人道主义、教化传统、“人本”思潮以及生态意识兴起的关系,指出了

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多重面向。其间,不仅阐述了“动物之发现”与复杂的中国现实的密切关联,揭示了动物叙事的范式转变以及这一转变背后隐藏的社会历史因素,而且对动物叙事与中国现代社会思想文化,尤其是与伦理观、价值观的密切联系,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提出了自己的学术见解。在此过程中,作者从动物叙事的角度,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一系列重要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作出了富于新意的解读,给人以启发。比如他指出,中国传统思想中不存在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逻辑发展线索,中国当代思想也没有发展出视动物为“生命主体”的伦理观,但在当代生态文学的创作中,上承鲁迅、巴金等现代传统,又感应于愈演愈烈的生态危机,动物叙事中出现了视动物为伦理主体的自觉的生命意识。这一意识的出现具体体现在作品中的动物从“象征符号”到“生命主体”的演变。类似的论断是从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实际出发的,具有较强的理论概括力。

文学是“人学”,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人”的认识和理解可以仅仅局限于人类自身。当包括动物在内的自然界与人类生活发生密切关联时,将其纳入“人学”的视野,作为观照和把握文学创作的途径之一,自然而合理。克龙君的著作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尝试,今后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例如,进入 21 世纪以来,当代文坛动物小说层出不穷,部分作品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在学理层面上引发了不少争议。目前本书对此虽有涉及,却还明显不足。这与作者完成博士学业时一些比较重要的作品刚刚(或尚未)问世有关,但毕竟是一个缺憾。相信在今后的研究中,克龙君将进一步开拓视野,深化和完善自己的思考。

目 录

绪 论	(1)
一 研究的缘起和选题意义	(1)
二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8)
三 本书研究对象、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15)
第一章 动物叙事与人道主义思想:当代以前的状况	(17)
第一节 人道主义统驭下的动物叙事及其分化	(17)
第二节 原配蟋蟀、猫和鼠、科学观念及报仇的恶念: 鲁迅和他的动物叙事	(23)
第三节 “人我互惠”的人道主义思想与文化批判: 周作人和他的动物叙事	(44)
第四节 “爱人类”和爱动物的歧异与统合: 巴金和他的动物叙事	(64)
小 结	(76)
第二章 动物叙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教化传统	(77)
第一节 动物叙事与“正确思想”的生产	(80)
第二节 周涛:感性视野中的“动物政治学”	(87)
第三节 动物叙事与民族心灵中道德衰微的象征	(94)
第四节 动物叙事与“国民劣根性”的当代揭示与批判	(99)
第五节 动物叙事的“人间主题”及其困境	(105)
小 结	(111)

第三章 动物叙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人本”思潮	(112)
第一节 中国语境中的可疑的“人本”	(112)
第二节 动物叙事与意识形态规范下的英雄主义	(119)
第三节 从深山狗鱼到黑谷白狐:走向真的“人本”	(124)
第四节 走出山谷的“猎神”与受到质疑的“人本”	(132)
第五节 人、狗、荒原:非理性之思与“人本主义”	(139)
第六节 动物叙事与建立整体主义伦理的尝试	(146)
小 结	(151)
第四章 动物叙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一)	(152)
第一节 动物叙事与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兴起	(152)
第二节 动物叙事与发展之痛:《老海失踪》、 《哦,我的可可西里》	(166)
第三节 动物叙事与消费主义批判: 《酒国》和《四十一炮》	(178)
小 结	(190)
第五章 动物叙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二)	(192)
第一节 哲学上的争论:动物有道德地位吗?	(192)
第二节 当代生态文学中的动物叙事与生命 意识的兴起	(206)
第三节 动物的“高贵和庄严”:叶广芩的动物叙事	(215)
第四节 往来“人畜”之间的“通灵者”: 刘庆邦的动物叙事	(222)
第五节 为生命“苦辩”:张炜的动物伦理	(228)
小 结	(239)

第六章 当代诗歌与动物叙事	(240)
第一节 当代诗歌中的动物叙事简况	(240)
第二节 于坚诗歌中的动物叙事	(247)
小 结	(260)
第七章 当代文学动物叙事的多重面向	(261)
小 结	(273)
结 语	(275)
主要参考文献	(279)
后 记	(286)

绪 论

一 研究的缘起和选题意义

在具体的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实践活动中,研究和批评的对象可以是某一位特定的作家,如鲁迅;也可以是某一部特定的作品,如《红楼梦》;还可以是特定时期出现的某一文学思潮或文学现象。“动物叙事”研究属于第三种情况。“动物叙事”研究不是针对某一位具体作家或一部作品的微观研究,而是对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时间段内的一种文学现象的把握。诚如曹文轩所言,不去研究某一个专门作家或一部作品,而是选择“现象”作为研究对象,有它特别的好处:“现象是由众多作家的某一共同意向与相似性的实践形成的。对某一现象的把握,显然属于较为宏观的把握。在描述和分析这些现象时,我们很容易地就回避了对某一个作家的关注而可能感到无话可说的尴尬,我们可以利用的材料能够一下子变得丰富多彩起来。”^{〔1〕}实际上,把某一文学现象作为研究对象的好处不仅仅只是为了避免“无话可说的尴尬”或者贪图材料的“丰富多彩”,更重要的原因是,在一种文学现象中,常常会牵涉到许多风格各异、体裁多样的作家的创作,在“某一共同意向与相似性的实践”过程中,他们会不期然地形成类似于“家族相似性”的审美特征。考察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发展脉络以及未来的走向,探讨它与社会变迁

〔1〕 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绪论》,《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2~13页。

和思想文化发展转换的关系、它的相似的审美特征当中的相异性,无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在现当代文学不算短暂的发展历程中,从新文学的奠基人鲁迅、周作人等一直到世纪末的当代作家张炜、陈应松、沈石溪等,动物一直都是他们关注的写作对象,“动物叙事”这一文学现象可以说贯穿了 20 世纪迄今中国文学的整个发展历程。但关于此一文学现象的研究,各种文学史和批评论著要么付之阙如,要么浅尝辄止,至今未见有全面、深入、系统的成果面世,这是颇为遗憾的一件事情。20 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动物叙事到底呈现出怎样的整体性,动物叙事究竟与历史变迁中的思想文化形态有着怎样的关联,动物叙事如何形成它自己的逻辑线索?这些都是有关动物叙事的研究要回答的问题。本文将在一个宏观的历史文化框架内,尝试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讨论,以期填补现当代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空白。

实际上,动物叙事研究要关注的中心问题是,人究竟怎样对待动物。因为自从人类在地球上出现以来,人与动物的关系就一直是个复杂而饶有趣味的问题。人类到底怎样对待动物,是这个问题的核心。英国动物学家德斯蒙德·莫里斯(Desmond Morris,一译莫里斯)认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高级动物都以五种方式来对待与其共处同一环境中的其他物种:“这就是把其他动物当作(一)供捕食的猎物,(二)共生者,(三)竞争者,(四)寄生虫,(五)掠夺者。”^{〔1〕}而“除此之外,人类还把动物当作科学研究与审美研究的对象,并把它们当作象征物来对待”^{〔2〕}。前五种方式都是人类从经济利益的角度作出的选择,而“把动物当成象征物的做法就完全不同了。这种做法既不考虑经济的因素,也无需作深入的研究。动物只被用来作为概念的体现。如果一种动物

〔1〕 [英] D. 莫里斯著,周兴亚、阎肖锋、武国强译:《裸猿》,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1 页。

〔2〕 [英] D. 莫里斯著,周兴亚、阎肖锋、武国强译:《裸猿》,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1 页。

面目狰狞,它就成了好战的象征。如果它举止笨拙,模样惹人爱怜,它便成了幼稚的象征,至于它是否真的凶狠,或真的惹人爱怜,关系并不大”〔1〕。

因此,这样看来,不管是在生态意义上的共生、竞争,还是实践上的使用、虐待动物(比如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或者爱护、保护动物(比如动物保护主义),抑或是在观念上给予动物以某种地位(比如在哲学上、文学上有关动物身份的讨论),实际上都与人类伦理意识的演进这一根本问题紧密相关。传统伦理学只讨论人际道德关系及与此有关的原则或规范,而无意或不屑关注人与自然、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关系,显示了人类伦理观的偏狭与盲视。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受日益膨胀的理性意识和进步观念的推动,人类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以全球扩张和资源榨取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创造了巨大财富,但同时也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全面紧张。包括动物在内的许多物种因为人类活动而失去了它们的栖居之地,有许多已濒于灭绝或已经灭绝。在此背景下,调适人与自然、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新主张亟须出现,传统的伦理学已到了更新知识架构的关键时刻。

那么,作为伦理观念重要表现样式的文学创作,它在表现人与动物伦理关系变革的进程中,究竟做了一些什么?这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兴趣所在。众所周知,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叙事文本。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一个较长的时间概念,它与一个多世纪以来激烈的社会变革和思潮递嬗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此时段出现的动物叙事,实际上也与这样的社会变革和思潮递嬗密不可分。更具体地说,动物叙事牵涉到中国现代伦理意识的缓慢推进:通过分析不同时空情境里的动物叙事语法,我们不但可以为动物叙事建立一个初步的知识系谱,更可以借此从一个侧面认识一个世纪以来人与动物、

〔1〕 [英] D. 莫瑞斯著,周兴亚、阎肖锋、武国强译:《裸猿》,光明日报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58 页。

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变迁脉络。而对此脉络的把握,又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与此相关的复杂的中国现实。

在20世纪中国文学动物叙事的演变过程中,动物形象经历了从“象征符号”到“生命主体”的艰难转换或曰“进化”。所谓“象征符号”,是指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动物叙事中的动物所处的认识论地位和功能。象征是一种认识手段。“法国学者拉朗(Laland)认为‘象征’即‘以类似对应物表现另一事物者’”^{〔1〕},帕斯卡尔则注意到“象征”的认识论价值。他说,象征展示真理,“一切都在象征之中到来”^{〔2〕}。这和康德认为“象征”这种“直觉”方式能够“间接”指示“没有对应”“直接客体”的概念相似。^{〔3〕}在黑格尔那里,“抽象的、未受定性的”理念本身不能“产生出一种适合的表现方式”,而只能“在它本身以外的自然界事物和人类事迹中去找它的表现方式”,然后“用这种客观事物隐约暗示出它自己的抽象概念或是把它的尚无定性的普遍意义勉强纳入一个具体事物里”,以至于意义和形象仍然“彼此外在”,互不相干。^{〔4〕}黑格尔并认为,“象征首先是一种符号”^{〔5〕}。这种符号的“意义和它的表现的联系是一种完全任意构成的拼凑”,它“很少让人只就它本身来看,而更多地使人想起一种本来外在于它的内容意义”。^{〔6〕}比如“狮子象征刚强,狐狸象征狡猾”等等,使人意识到的不是具体的个别事物,“而是它所暗示的普遍性的意义”。^{〔7〕}上述关于“象征”的理论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现

〔1〕 张沛:《隐喻的生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7页。

〔2〕 [法]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20页。

〔3〕 [德]康德著,邓晓芒译:《判断力批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

〔4〕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序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5页。

〔5〕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序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6〕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序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0页。

〔7〕 [德]黑格尔著,朱光潜译:《美学》(第二卷)第一部分序论,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1页。

当代文学动物叙事中的动物形象。概括说来,在中国的具体语境里,文学中的动物长期以来只是某种“象征符号”,它们存在的价值是为了“暗示”某种“普遍性的意义”。这些“普遍性的意义”可能是伦理化的,也可能是意识形态化的。本书将着力揭示这些“象征符号”所代表的“普遍的意义”之各种变体,由此而认知现当代文学的曲折演进。

作为“象征符号”的动物具有一种“认知隐喻”功能,它通过对“普遍性的意义”之“暗示”而让渡了自己的主体性。动物的这种认识地位有悠久的哲学起源。亚里士多德认为“所有其他动物活着是为了人类”。不仅仅是给人类果腹,同时也济人类的认识之穷,即充当“认知隐喻”;托马斯·阿奎那重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并将其纳入自己的神学体系之中;而17世纪的笛卡尔则从另一角度,进一步巩固和强化了这种观点。笛卡尔把世界分成意识和物质(minds and bodies)两种基本类型。“精神王国包括所有的思考、感觉和意识。物质王国包括物理和空间的一切事物,它被认为是纯机械的,没有一丁点儿的思想。”^{〔1〕}“动物是机器”,这就是笛卡尔的观点。“机器”当然是无意识的,而“意识是道德身份的判据”^{〔2〕},这就是说,动物没有道德身份,也就是说它没有主体性;康德也认为只有人类才有道德身份,对动物等自然事物,我们只有间接义务;边沁则开始考虑道德关怀的扩展问题。他把道德关怀的领域扩充到所有可感受愉悦与痛苦的事物包括动物。他认为,动物是否具有道德身份,并不在于它们是否有理性,“并非它们能否作理性思考,亦非它们能否谈话,而是它们能否忍受”^{〔3〕}。边沁的这种观点直接影响了当代“动物解放”运动的先驱彼得·辛格(Peter Singer)。辛格认为,漠视动物利益的行为正如早年将黑人与妇女拒之门外的种族主

〔1〕 [美] 戴斯·贾丁斯著,林官名等译:《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2〕 [美] 戴斯·贾丁斯著,林官名等译:《环境伦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3〕 [英] 边沁著,时殷弘译:《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9页。

义(racism)和性别主义(sexism)一样,是一种“物种主义”(speciesism)。辛格认为,具有忍受痛苦或体验快乐的“知觉”(sentience)能力是动物拥有“利益”(interests)的必要条件,因此动物是值得道德关怀的对象。^[1] 汤姆·里根(Tom Regan)则从动物“权利”的角度,论证动物具有道德身份。里根认为,非人类动物之所以拥有像我们人类一样的权利,是因为它们也是“生命主体”(subject of a life)。因为它们也有“内在生命”(inner life),包括有意义的欲望和需要,而不仅仅是“活着”,这是它们拥有“权利”的基础。^[2] 法国当代哲学家施韦泽(一译史华泽)“敬畏生命”的伦理观也对动物道德身份之确定具有重大影响。阿尔伯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被爱因斯坦誉为20世纪西方世界唯一能与甘地相比的具有国际性道德影响的人物。施韦泽认为,传统的关于人与人的伦理学是不完整的,伦理学的爱的范围应扩充到动物。敬畏生命不仅要求敬畏人的生命,而且要求敬畏动物和植物的生命,要“把爱的原则扩展到一切动物”。只有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只有当人认为所有生命,包括人的生命和一切生物的生命都是神圣的时候,他才是伦理的”^[3]。

上述关于动物道德身份的讨论构成了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保护运动的基础。随着中国以“发展”为目标的改革开放运动的深入展开和新的消费模式的形成,生态危机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在此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生态文学写作蓬勃兴起,生态意识统治下的动物叙事亦大量涌现。值得注意的是,此期的动物叙事开始正视动物作为“生命主体”的地位,而此前将动物作为“象征符号”,伦理化、意识形态化的写作模式开始衰退。这并非没有意义,这种模式转变意味的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曲折

[1] [美] 芭芭拉·麦凯南编:《伦理学:原理及当代论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英文影印版,第391~392页。

[2] [美] 芭芭拉·麦凯南编:《伦理学:原理及当代论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英文影印版,第392页。

[3] [法] 阿尔伯特·施韦泽著,陈泽环译:《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9页。

变化,意味着文学在外部现实的促逼之下,它的“内面”之深刻变迁。

本书将集中探讨促成这种模式转变的内外因素,从而揭示中国现当代文学“内面”的深刻变迁。日本学者柄谷行人在《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里考察了“风景”、“内心”、“自白”、“病”、“儿童”及“叙述方法”等现代文学制度的“发现”与形成过程,挖掘文学现代性的“起源”乃至它与“国民”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共生关系。^{〔1〕} 柄谷行人的思路给予我很大的启发。实际上,探讨“动物叙事”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演进轨迹,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也是一个“发现动物”的过程,这也属于柄谷行人所谓“风景之发现”的一部分。“动物叙事”在鲁迅等现代作家那里实际上已确立了某种现代品格,以“生命意识”为中心的动物叙事显示了鲁迅等先驱者的人道主义关怀。但是在进入当代文学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传统遭到了抛弃。只有在政治意识形态语境逐渐宽松之后,在世纪末期,在新的历史性规定下,才又重现了这一传统。因此,“发现”动物从“象征符号”“进化”到“生命主体”,亦即“发现”动物从认识论工具进步到伦理学主体,这对动物伦理学的知识积累也许不无助益。但是从根本上说,文学领地内的动物叙事研究,它的基本目标还是达成对于文学发展本身的认识。换言之,考察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动物叙事,目的在于从一个别致的角度来认识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体认它与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关系,并由此探讨中国现代伦理意识中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历程。“从象征符号到生命主体”是一个逻辑演变过程,这个过程受制于复杂多变的中国语境。本书的意义即在于,通过对“动物叙事”中形形色色的变体之考索,探索这二者可能的关系。

在学理层面上,本文通过考察动物叙事与人道主义、教化传统、人本主义以及生态意识的兴起等问题的关系,试图建立中国现当代文学

〔1〕〔日〕柄谷行人著,赵京华译:《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中动物叙事的基本逻辑构架;在实践意义上,关于动物叙事的历史研究和美学研究将为创作主体的创作实践提供有益的借鉴。

二 研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动物保护”、“动物解放”、“动物权利”、“动物福利”等等有关动物的“叙事”,在哲学、环境伦理学、生态保护运动和公共领域内都是一个热门话题,但是在文学研究领域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虽然已经有一些零星的研究注意及此,但系统完整、具有历史性视界的动物叙事研究尚付阙如。应该说,文学研究在应对早已出现的“动物叙事”这一文学现象时是严重滞后的。并且,就那些零星的研究来说,因受制于学术视野,也大都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动物叙事”不应受到冷漠对待,不说出于“敬畏生命”的伦理态度,即就文学知识的积累而言,我们也应以一个文学研究从业者的职业敏感和责任感来认真看待这一文学现象。

在为数不多的与动物叙事有关的研究中,季红真较早注意到了“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意识”。她认为,对“自然意识的自觉,在中国当代社会中最初是和极端的主观态度联系在一起的。五十年代末期的‘左’倾政治思潮及它所导致的‘大跃进’运动中,形而上学的唯意志论,几乎完全无视人与自然依存的方面,片面夸大了人与自然对立中的主体能力方面。反映在浪漫主义的文学思潮中,即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极度主观态度”^{〔1〕},60年代初的一些作家以表现人的自然情感为最高美学追求,虽还残存着唯意志论的影响,但已“潜藏着对前一时期极端主观态度的反拨,也暗涵着人们调整 and 自然被人为颠倒的关系的愿

〔1〕 季红真:《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意识》,《美学新潮》第1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54页。

望”^{〔1〕}。但“文革”时期,极“左”思潮漫没了此前相互直观的自然意识,人与自然的客观物质联系和精神联系都被扭曲和抹杀。进入文学“新时期”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才在文学创作中得到大量的表现和审视。季红真的检讨只到1984年为止,但她在文章中表现出来的历史感和理性批判精神对于考量动物叙事具有极大的启发意义。因为她虽然没有直接顾及“动物叙事”这一话题,但“动物叙事”的某些部分实际上是包含在她关于“自然意识”的讨论之中的。

而此后,有关学者则注意到了“自然意识”在当代知青文学中的具体表现。他们认为,“在知青小说中,许多作家的自然意识重又觉醒,他们把目光投向自然,通过对自然的描绘和刻画,通过在大自然背影下蠕动着的人物塑造,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反映了人与自然的艺术关系。‘大自然意识’这个文学的永恒主题,在经历了一场大的劫难之后,终于在人们的精神意识中复归了。”^{〔2〕}不过,和季红真一样,他们也只是笼统地谈论到了文学作品中的“自然”作为一个整体意象的出现,而没有涉及具体的动物叙事在其中的表现。

李新宇也较早注意到了当代文学中“人与自然”主题书写的变化。在发表于《当代文坛》1989年第1期的论文《论近几年文学中的人类危机感与自审意识》中,他指出,20世纪80年代晚期的当代文学创作已经出现了不少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品。而在此前的当代文学中,这种思考是少见的:“我们的当代文学出现过大量的以征服自然为题材的作品,我们已习惯了在描写人对自然的征服中表现人的伟大。而上述作品却反其道而行之,让人在自然面前退让,抑制自己的贪欲而保护自然。这是一个意义深远的巨大变化。”^{〔3〕}在这些作品中,“人不仅作为

〔1〕 季红真:《当代文学中的自然意识》,《美学新潮》第1期,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页。

〔2〕 张艳梅、吴景明、蒋学杰:《生态批评》,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78页。

〔3〕 李新宇:《论近几年文学中的人类危机感与自审意识》,《当代文坛》,1989年第1期。